

國學新聲

章炳麟



刘毓庆 主编

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
山西大学文学院
主办

【第二辑】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新声. 第2辑 / 刘毓庆主编.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457-0169-2

I. 国… II. 刘… III. 国学—中国—文集 IV.
Z126.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431 号

国学新声(第二辑)

主 编: 刘毓庆

责任编辑: 朱 屹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169-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学的基本素质及其当代意义（代序）

刘毓庆

上一轮的世纪之交，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批志士仁人自觉肩起了承传中国文化的使命，为对抗以利益追求为最高原则的“西学”，提出了“国学”的概念。最具代表性的是章太炎先生，他在《国学讲习会序》（载《民报》第7号）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本来在与“西学”的对峙中，中国学者已创造了“中学”的概念，以表示中国学术的个性。但“中学”犹如称“汉学”，是一个隐去主体立场、缺少情感维系的科学名称，而“国学”则寄寓了中国人无限的爱国情感，它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故而在上世纪之初，以太炎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人，为保护自己的精神家园，掀起了国学研究热潮。随后民族救亡运动、政治斗争运动、文化革命运动等诸多全民性运动的接连发生，“国学”潮痕被冲刷得无影无踪。直到新一轮的世纪之交，在西方文化更为强烈的冲击、扫荡下，新的国学研究运动才蕴含着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深厚力量，沉稳而持重地开始了新一轮的运作。两次国学运动明显地有着不同的目标。上一轮世纪之交，以太炎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哲人，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提出“国学”概念的，而新一轮的国学运动的参与者，则是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下发现的“国学”，他们在“国学”中寄寓了更多的期待。他们不像上一轮的国学倡导者那样极力“保持自我”，而是以一种博大的“世界精神”面向人类未来，看到了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未来生存的巨大意义。他们不仅要扬起中华民族高昂的头，而且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在世界性的人类文化大选择中，让中国文化为全人类的和平、幸福做出贡献。

“国学”是一个载体，它所运载的就是“中国文化精神”。从传统国学“经、史、子、集”四科分类讲，“经”是中国人的精神，“史”是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子”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技能，“集”是中国人的情怀。四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殊风格。这一文化以其五千年的健康发展，证实着她的优异与伟大，也证实她对人类的永久性意义。此时此刻，我们仿佛也听到了处于种种困扰中的人类灵魂，向中国文化发出的深沉而急促的呼唤！



目前人类危机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呼唤

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现代文明，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 世纪一百年人类的创造，远远超过了过去几十万年的总和。然而在人类物质文明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的时候，人类也出现了空前的大危机。在因特网上可以看到社会各方对人类生存危机的呼吁与恐惧，有人还专门写了一份 25 万字的《21 世纪人类生存危机报告》。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者提供的数据中，看到危机的严重性。如能源问题，根据《科学中国人》杂志 2003 年第 8 期《能源危机与对策》一文提供的数据：

石油储量大约在 2050 年左右宣告枯竭。

天然气储备将在 57—65 年内枯竭（本世纪中期）。

煤的储量可以供应 169 年（下个世纪后半叶）。

铀可维持到 21 世纪 30 年代中期。

这些能源，是支撑现代文明大厦的钢筋水泥。一旦枯竭，现代交通、通讯皆会全部瘫痪，现代城市消失，人类退回史前，这是多么恐怖的一幕！

再看地球生态。地球是人类赖以存身的家园，可是近年来遭到的破坏令人不寒而慄。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一系列报告：

世界耕地面积的 $\frac{1}{5}$ 至 $\frac{1}{3}$ 正在消失。

每年约有 620 万公顷的土地遭受荒漠化，受害国家达 110 多个，10 亿人口受到直接威胁。

每年约有 600 多亿吨肥沃的表土流失，使 2000 万公顷的土地丧失生产力。全球地力衰退和养分缺乏的耕地面积已达 29.9 亿公顷，占陆地总面积的 23%。

每年约有 1.5 万至 5 万个物种消失。目前，地球上的物种已消失了 25%，还有 20%—30% 存在灭绝的危险。

森林每年以 2000 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其中多半是对维系地球生态平衡起重要作用的热带雨林。

淡水供应严重不足，目前全球一半的河流水量大幅减少或被严重污染，100 多个国家严重缺水，20 多亿人饮用水紧缺。预计今后 30 年内，全球约有 $\frac{2}{3}$ 的人口处于缺水状况。

现代工业排气导致地球温室效应加剧，北极地区的冰盖已减少了 42%。近 100 年来，海洋面上升了 50 厘米。如果温室效应继续下去，海洋面再上升 50 厘米，全球 30% 的人口就得迁移。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洪水、旱灾等自然灾害频仍。上个世纪 80 年代，全球每年受灾害影响的人数平均为 1.47 亿，而到了 90 年代，这一数字上升到了 2.11 亿。

地球生态的大破坏，可以说是比能源危机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能源没有了，人类可以倒退到史前的生活状态去。可是地球给破坏了，我们连史前也回不去。有专家称人类正在导演地球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更为恐怖的是战争危机。据新闻界披露的一份五角大楼的绝密报告称：今后 20 年气候的突然变化，将导致地球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各国都将纷纷发展核武器来捍卫粮食、水源和能源供应。全世界届时将爆发巨大的骚乱、饥荒甚至核冲突。这并非没有可能。目前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国家是美国、俄国、英国、法国和中国。但许多国家都在秘密研究，据《环球时报》的一篇报导称，目前世界上具备研制核武器潜力的国家数量已经超过 40 个。核武器是干什么的？是杀人的！人类的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了杀人武器的制造上，这不能说不不是人类的悲哀。据上世纪 80 年代的数据统计：全球拥有核武器的总数量为 200 多亿吨梯恩梯炸药当量，相当于全世界每人头上悬挂了 10 多吨的梯恩梯炸药，如果爆炸，可以摧毁地球 25 次。现在的数字又要远过于此了。这就意味着，人类在一个晚上就可能使自己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此外，像污染、饥饿、暴力、吸毒、自杀、“非典”、艾滋病、禽流感、恐怖活动等，无一不是对人类的重拳出击。

面对人类严重的生存危机问题，西方大批有识之士提出了种种解决方案，科学家们提出了大力发展再生资源的问题，如太阳能、风能、光伏电力以及发明新技术从宇宙间摄取能源等等。联合国有关组织在上世纪后半叶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并相继发表了国际性的系列环境保护文件。由世界著名科学家、作家和未来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在上世纪 70 年代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提出了“安定化政策”构想。与此同时，有关学者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伦理学理论等。

但是，在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国际组织的不断呼吁声中，人类的危机却仍在一步步加深。原因何在？很显然，这些方案、理论和呼吁，或许能对人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可是这能制止战争吗？能阻挡暴力、恐怖等种种反人道的事件发生吗？能阻挡发达国家不去占用或控制别国的资源吗？要知道，人类危机的出现，最根本的在人心，在人类无限度地追求利益的“贪念”。现在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个人消费却占全球的 90%。美国人口还不到世界人口的 5%，消耗的能源却占世界能源的 34%。据有人估计，全



世界都达到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人类需要三个地球的资源；都达到美国人的水平，则需要五个地球的资源。这种所谓的发展，如何得了？

而且人心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一些国家为自己的利益，根本不会遵守什么国际公约。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第二届国际环保大会，与会的113个国家代表共同签署了包括26项条款的《里约热内卢环保宣言》。但是会后，一些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按照会上有关环保问题的承诺行事。在五年之后的1997年12月，联合国组织了由世界160多个国家代表出席的第三届国际环保大会，会议在东京召开，会上出台了《京都议定书》，并且按照每个国家的情况，制订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具体指标。可是事后又有些国家宣布退出《议定书》。为什么？因为这样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发展。有些发达国家因对在本国生产和储存化学有毒物体存有戒心，于是便将这些化学有毒物体运往发展中国家加工生产所需品。像这种行为，所谓“安定化政策”、可持续发展理论显然都是不能解决的。

20世纪在以物质利益为追求目标的西方文明的主导下，两次世界大战相继发生。局部战争连续不断。据匈牙利一位人类学家1983年公布的统计数字：“二战”后的37年里，世界上又爆发了470余起局部战争。这37年里，没有任何战争的日子只有26天！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将近一个亿。沉痛惨烈的现实，使部分西方学者把目光转向了东方的中国。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博士，原初曾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僵死的走向死亡的文化，可是到晚年的反思中，却认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第1版）他在一次报告中还提出：“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汤因比《谁将取代西方的主导地位》《思潮》1994年第9期）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先生的谈话中还提到：“近代物质文明的危机，本质在于‘道德差距’。就是说，‘善性’衰退，人类的伦理、道德水准低下。要克服这些，提高人类伦理性，巨大的力量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世界精神’。”（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1875—1961)在他的《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中指出：应该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了的心灵，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慧，应该让他们放弃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拆穿他们拥有力量的幻象。这已导致千百万人付出生命。（荣格著 杨儒宾译《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7月版）



在 1988 年巴黎召开的“面向 21 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著名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公元前六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Canberra Times. Canberra, Australia, 24 January 1988）

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黎华伦在《儒学的复兴》一书序言中说：“北亚古老的神话和圣哲，看来更可能替代西方文化成为我们‘地球村’未来的中心。”（李瑞智、黎华伦著 范道丰译《儒学的复兴》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5 月版）

也就是说，在人类到了最危机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越来越强烈的呼唤中国传统文化的声音。同时，中国一批旧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也做出了积极的呼应。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提出了“21 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论断，认为“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季羨林《东学西渐与东化》，《东方论坛》2004 年第 5 期）北大张岱年教授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世界的意义，概括说起来就是能够有助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道德与生命三种关系。”（张岱年《谈谈中国传统文化》，《河南林业》1998 年第 4 期）北大汤一介教授提出：在世界文明的冲突中，“儒家的‘仁学’为‘文明的共存’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资源。”（《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访谈》祝乃娟 21 世纪经济报道）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教授提出：“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努力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和谐思想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积极因素，人类社会就有可能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合作的道路。”（何兹全《把和谐思想融入人类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提出了“和合学”理论，认为“和合学是求索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化解之道，是文化方式的最佳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五大原则，是 21 世纪人类的最大原理和高价值。”（张立文《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与 21 世纪》）

那么，中国文化到底具备怎样的素质，引起了如此多学者的关注呢？

中国文化具有从根本上消除人类危机的基本素质

不过需要说明一下，我们这里所谈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中国现在的文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目前出现了断裂，这在后面我们还要提到。

我们之所以要提出“根本”两个字，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要解决的是“人心”和“人性”的问题，而目前人类的种种危机，最根本的实际上就是“人心危机”、“人性危机”。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现代西方文明，所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的发展，所追求的是人类欲望的满足。欲望是一种创造力，同时也是人类趋向灭亡



的动力。中国有句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好了疮疤忘了伤。”人心是无穷尽的，在欲望的冲动下，人类是会忘记历史教训的，所谓“利令智昏”，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只有从人心、人性上考虑，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人心、人性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根本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系统。关于它的当代意义，学者们的关注点不同，所以取舍也不同。如张岱年先生拈取的是“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两个基本精神，何兹全先生拈取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与中庸之道的和谐思想，汤一介先生拈取了“天人合一”思想。我这里则将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基本素质归纳了八种，当然还会有很多，这里只说这八种。

第一：“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消除生态危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称天、地、人为“三才”，认为这三者是“万物之本”，相互联系着，不能分开。所以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礼记·礼运》篇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是说天地本没有心，没有理性，有了人才有了心，有了理性，人是天地的代言人。没有天地人无法生存，没有人天地之理不能彰明。那些得道的大圣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大传》），成为天地自然之道的化身。所以说“圣人之道”，“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礼记·中庸》）。《毛诗传》中反复提到“太平而后微物众多”（《毛诗·鱼丽传》）、“太平则万物众多”（《毛诗·鳧鷖传》）的现象，在文献中，我们经常看到关于太平年间“五谷熟，草木茂”的描写。如汉代的大儒公孙弘描写上古圣人治天下时就说：“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汉书·公孙弘传》）《宋书·符瑞志》也说：“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这表示古代中国人，并不只是关心人的生存，同时对万物繁庶也表示了极大的关切。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与万物共生、共存、共荣的精神。这种精神使这个族群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制定出了大量保护自然生态的措施。像周文王作为一代明君，临死时给儿子留遗嘱，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让他善待万物，保护生态。

当然“天人合一”还有更多的意义，它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基石，像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人格理想、价值判断等都与“天人合一”有诸多联系。我们这里只是强调“天人合一”对于解决目前人类危机问题的意义，所以其它方面就不予涉及了。

我们知道，过去在西方文化主导下，人们考虑的不是要与自然共生共荣，而是要开发自然，征服自然，让自然为人服务。但要知道人想征服自然，让自然成为人类的奴隶，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因为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一体的。《韩非子·说



林下》有这样一个故事：有种叫作“虺”的怪物，长着两个脑袋。为了争夺食物，两个脑袋相互撕咬。一个把另一个咬碎了，可它自己也完蛋了。因为它们本是同体的。这个滑稽而又富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很能说明目前人类征服自然而导致生存危机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对于人类认识自然、收敛征服自然的行为、挽救生态危机，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也非常同意汤一介先生的观点，他说：人类社会发展到 20 世纪末，西方哲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病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其弊端不能说与“天人二分”没有关系。因此，如何补救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病，并为 21 世纪提供一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之观念，我认为“天人合一”的观念无疑将会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汤一介《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定位》，《中国文化研究》2000 年第 4 期）。

第二：“勤俭”、“知足”的生活观念，有利于控制人类物欲的膨胀，消除能源危机。

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诸多问题，实际上都和人类不知满足的生活追求、不知节制的生活消费有关。就拿中国和日本所用一次性筷子来说，日本每年所用约 257 亿双，中国所用约 450 亿双，这需要砍掉将近 400 万棵树，毁掉 300 多万平方米的森林面积。这是一个多大的浪费数字！而这种生活方式和观念，恰恰是中国传统最反对的。

中国传统的生活观念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勤俭”，二是“知足”。“勤”是勤劳工作，不坐吃闲饭；“俭”是生活俭朴，节约财用。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像大禹、文王，都是这方面的榜样。传说大禹穿的是很破旧的衣服，吃的是很粗糙的饭菜，可却一心为天下百姓着想，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周文王则是为了工作，把吃饭都能忘了，而且还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中国传统许多人家的门额上挂着“勤俭持家”、“克勤克俭”、“勤俭传家”的牌匾。那些名人“家训”中，一定要把“勤俭”写进去。《左传》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宋朝的司马光在家训中对这两句话作了很好的解释，他说：“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传家集》卷六十七《训诫示康》）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人以勤俭为本的生活观念。

“勤俭”所要解决是生活物资的问题，而“知足”则是要解决人心的问题。人在物质上的享受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只有“知足”，才能制止“贪欲”。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四章说得很明白：“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意思是说，人最重要的是生命，名和利都是身外之物，过于追求名誉和金钱，就会伤及生命自身，得不偿失。要能知道满足，抛弃贪婪的念头，就不会让自身受辱。要适可而止，就不会为金钱声色所累。《韩诗外传》也说：“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卷九）说穿了：就是贪婪的欲望追求，是人类罪恶和灾祸的根源。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古代标榜“安贫乐道”，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都是为了杜绝罪恶与灾祸的发生。

“勤俭”和“知足”是相辅相成的，知足并不等于没有追求，没有上进。追求与上进就体现在一个“勤”字中。“俭”则是合理的支配财物，以免匮乏。知足则要求适可而止，不要贪得无厌。显然这种生活方式与观念，对于遏制目前人类无限度的开采资源、无节制的追求生活享受、倡导“消费刺激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贵和执中”的处世思想，有利于世界各民族和睦共处，消除战争危机。

“贵和执中”其实就是中庸思想。所谓“中庸”就是中正不变的恒道，用宋代大思想家程颐的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中庸章句》）《礼记》中有《中庸》篇，就是专门阐述中庸的。“中”与“和”是相联系的，《中庸》篇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定位，是要处的位置，这就有个度的问题，也就程颐说的“不偏不易”，恰到好处。“和”是运作，是处理方式。能够把握住“中和”两个字，就会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但“中和”并不是不讲原则。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又说“君子和而不流”。“不同”、“不流”都是要保持个性，坚持原则，并不是随风倒。而和则是要和谐相处。

根据儒家关于“中庸”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好多内容，但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中庸里包含的两种基本的精神，一是“包容”，一是“和谐”。这两种文化精神，决定了中国文化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绝高地位的孔子，他所提倡的仁、义、礼、智、孝悌、忠恕等，一切带有温情的道德观念，无不是以“和谐”为基本精神的。所谓的“仁”，实际上强调的是人内在心性的和谐；“义”则是强调平等关系的和谐；“礼”是强调上下关系的和谐；“智”是强调自我与外物的和谐；“信”是强调彼此心理联系上的和谐；“孝悌”是强调血缘内部关系的和谐；“忠恕”是强调集团内部关系的和谐。其它如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等，都是以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为旨归的。而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这个“和”字既是和谐，



同时也是讲相互包容的。在中国人的习俗生活中，处处可体现出“包容精神”来。中国不少庙宇中，既有和尚，又有道士；庙宇中的塑像，有时是儒、道、释三家的始祖同处于一个殿堂上。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更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包容”的特色来。中国民族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包容史”。从南北朝时期的五胡政权，到元、清两朝的蒙古、满族政权，一个个都被中原民众所接受。古代民族之间的冲突，最终都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消解而走向了统一。“包容”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在相互承认“不同”的基础上，达到“和”的状态。

《国语》里有两句名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郑语）汤一介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而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窒息生机。如果琴瑟老弹一个声音，岂不令人生厌？而融合多种乐器的交响乐才是真正的和谐。”他又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明固然可以引起冲突，但多元文化同样可以并存不悖，世界需要多姿多彩。”（人民日报 2004 年 12 月 24 日杨雪梅《汤一介教授：找回民族力量之所在》）这话说得非常好。

“中庸”思想中的和谐、包容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共生”、“共存”精神。而现在人类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只有相互包容，和谐相处，才能消除核战争的威胁，使世界多元文化共生、共存，让世界更多姿多彩。

第四：“贵利贱义”的价值取向，有利于遏制人性向唯利之途滑行，消除技术危机。

“义”和“利”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义”是属于道德领域的，“利”是属于物质生活层面的。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认为“义”比“利”更重要。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是说作为君子，心里更应该考虑的是义，如果不合道义而能让自己富贵起来，那是打死也不能干的。物质利益谁也想得到，看用什么方式，得的是什么性质的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强调的就是在符合道德原则之下的利益获取，不义之财不能发，义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中国古代的平民思想家墨子也说：“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墨子·天志上》）强调的是义对一个坚持道德原则的人的重要性。如果为了利而放弃了义，那就是顶尖的大坏蛋。即荀子说的：“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修身》）有人认为这是把义和利对立了起来，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中国文化是强调“利”和“义”的统一。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则毫不犹豫地要“舍利取义”。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都是指在义利冲突



情况下的选择。

中国人“贵义贱利”的价值取向，上个世纪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962年，中国和印度在中印边界发生了一场战争。原因是在20世纪上半叶，印度在英国人的操纵下，占领了中国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的土地。50年代后，又趁中国新政府建立不久之际，继续向北扩张。同时中国政府认为西藏叛乱与印度暗中支持有关，于是开始了自卫反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就把失地全部收回。但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把收复的土地又给了印度。这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了。因为不可理解，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中国政府目的就是要让印度知道，我们不是贪利，舍不得这片土地，而是见不得你的不义行为，我们要教训教训你。

其实中国文化并不是不讲利，在《周易》中，几乎无卦不言利。不过中国文化强调追求大利而不是小利。什么是大利呢？就是“天下之利”。《周易文言》有两句话很值得注意，一句是：“利者，义之和也。”一句是：“利物足以和义。”所谓“义之和”，是说天利万物，使万物各得其宜，这是合于义的，故称“义之和”。用张载的话说，就是“义公天下之利”。所谓“利物足以和义”，实际上是说，让万物都获其利就是义。那种只为一己私利考虑，那自然不是义了。所以《孝经注》又说“利物为义”。用今天的话说，只考虑一人、一家、一国之利，而不考虑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那就是“小利”。能全为人类考虑，那就是大利，就是“义”，就是“公天下之利”。这正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利物为义”的境界。我们大家都知道岳飞的故事：岳飞正在率领军队势如破竹地击溃金兵的时候，突然被皇帝用十二道金牌调回了京城，最后因莫须有的罪名被砍了头。岳飞当时完全知道，自己回京会被杀害，但是他还是要回去。用今天的眼光看，岳飞是愚忠，自己军权在手，为什么不造反干掉那昏君呢？从岳飞自己利益来说，自己去送死不值得。可是要知道，岳飞是用他的死维护了一种纲常道德，维护了政局的稳定。如果不知道维护纲常道德，动不动就起来造反，那么中国的历史将会变成一部从头到尾的战乱史，不知有多少人会死于“造反运动”中。岳飞实际上是用一己之“利”，换取了天下的太平。这就是“义”，即子思所说的“利之大者”（《孔丛子·杂训》）。

如果“贵义贱利”的价值取向能够支配目前人类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侵略战争，也不会出现发达国家将有毒物品转移到第三世界进行加工的不道义的损人利己的行为了。而且人类也不会出现科学技术“力不从心”的危机感。

第五是：君子人格的人生目标，有利于挽救世道人心，消除人性危机。



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要教人如何做人，而“君子”就是儒家教育设定的一个人格追求目标。《论语》中的孔子，则是典范的君子人格。在《论语》与《孟子》中，对君子有很具体的描写，如好学善问、温厚宽容、崇德向善、慎言敏行、仁民爱物、见利思义、勇于改过、安贫乐道、严于律己等等，都是君子的基本品格。一句话，君子就是一个堂堂正正、不断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的人。君子的德、才、智都有高低之别，但他们能够不断学习，不断上进，追求人格的完满。孔子说“君子喻于义”，“义”是什么？义就是正义，是一种伦理规范，在行为上就是人间一种正气的表现。心中有个“义”字，便会行得正，站得直，把自己的利益搁在一边。君子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周围的人，或者周围的环境，考虑如何营造一种心情舒畅的环境，让周围的人感到温暖，由此而体现自己存在的意义。

当然在儒家的经典中所提出的关于君子的一些要求，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到，但那毕竟是一个人生的目标。儒家强调修养，修养就是要让自己心中、自己身上那些不合于道德规范的杂念与行为消失掉，培养心中的正气。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就是正气。正气支配下的行为自然是高尚的。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设定的君子人格目标，应该代表人类发展的主流方向，因为它把重点放在了人心、人性的修养上，这应该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君子的高尚带给社会的是安详，是精神上的舒畅，是人类永久的和平、安宁、幸福与快乐。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以君子人格为人生的目标，人类的征服欲与占有欲就不会膨胀到目前这种状态，核武器也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人类战争的威胁就不可能存在。可是目前我们却把人类的发展方向定位在了科技、经济的发展。要知道“现代科技”的飞船只能在人类的征服欲与占有欲极度膨胀之中起飞，伴随着的便是庸俗、丑恶、贪婪、冲突、竞争、相互倾轧。这导致了人性一步步恶化，使一批顶尖的科学家，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耗费在了杀人武器的创造上，使人类永无宁日，致使人类感到了覆灭的危机而恐慌不安。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流行的很多游戏软件，内容都是以杀人多少来取乐的。在游戏中，杀人竟然能成为一种乐趣，人性堕落到这种程度，难道这不是人类的悲哀吗？

第六：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追求，有利于人间温情的培养，消除掠夺与冲突。

“仁义”两个字，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成了道德的代名词。它是中国文化认定的一个做人的根本。中国人认为道德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而仁义则是一个核心。有很多人向孔子请教过关于仁的问题，孔子根据不同的对象做了多种回答。但最根本的回答有两点，一是“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一是“爱人”。



（《论语·颜渊》）所谓“仁者人也”，意思是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并履行做人的职责的时候，那就是仁了。这显然就是说仁是做人的根本了。所谓“爱人”，那就是对人要有慈爱之心。孟子说得更形象，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是人的居心，义是正当的行为。其实用最通俗、最简单的话说：仁就是人的那颗“善心”，也就是“不忍之心”。有了这颗善心，他就会走正道。所以仁和义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社会中，如果要指斥一个人说他“不仁不义”，那就等于是对他的根本性否定。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是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在孟子看来，人心中都存有善的一面，都有不忍之心，关键是怎样能够推广，由自己的身边推广到更远的地方。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孝敬自己父母，就可以想到别人的父母也是父母，也应该孝敬。爱自己的孩子，由此而想到别人的孩子也同样是孩子，也需要爱。

如果一个人要有一颗仁善之心，并能推而广之，那么，他就会对世界充满爱。中国古代有关于商汤与周文王“德及鸟兽”、“泽及枯骨”的故事，成汤看见有人用网捕鸟，把网做得像口袋，鸟只要飞进去，就别想再出来。汤觉得太残忍，于是要求网开三面，只留一面。文王让人挖水池，挖出了死人的骨架。文王觉得可怜，便让人好生安葬。这两个故事不一定是事实，但反映了中国人崇德向善的道德追求。这与西方人所倡导的博爱有些相似。有了这种善心，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温情脉脉。比如达尔文的学说，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残酷竞争的世界，而在中国古人眼里正好相反。中国最古老的经典《诗经》说：“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认为鹿发现了丰美的草地，便呼唤着让它的同类来一起享受。又说：“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认为小鸟的叫声是在呼唤它的朋友。连动物界都充满了爱，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然而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却是充满了竞争、掠夺、暴力，不少国家都在做战争准备，到处可以闻到火药味。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这似乎成了天经地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中的“仁义”二字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如果人类能把仁义做为一种基本道德，并能推而广之，世界也就会少去许多暴戾之气。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动不动出兵别国。自己在战场上死上几个人，就在媒体上大发其丧，把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痛苦，展现给观众。可请想一想，你们失去亲人痛苦，但要知道因为你们的暴力，有多少人失去了亲人？难道他们不痛苦吗？汤因比教授认为近代物质文明的危机，本质在于“道德差距”，“善性”衰退，这是很对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就是说：自己



不愿意的，就不要强加于人。我想人类应该把这作为一个准则。

第七：“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有利于消除民族及国家的本位主义，消除国际争端。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与他种文化的一个特大不同之处。《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实际上是说，天下大同是一种最美好的社会景象，它的美就在于“天下为公”，世界充满了祥和。这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社会理想，但这种理想中却洋溢着一种“世界精神”。这种“世界精神”关注的不是一人、一家、一国之利，而是天下之利。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个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就是“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所谓“天下”，就是所有有人类的地方。这是一种大胸怀，大气概，大抱负。这种气概、抱负，恐怕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存在。梁漱溟先生在对中、西文化作比较时曾说，西方人更重个人和国家，中国人更重家庭和天下（《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331-332页）。有人认为，中国人所谓的天下，其实还是中国。这是不对的。《礼记·中庸》里所说的“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显然不是中国所能包括的。

由于有这种“天下观念”和“世界精神”，所以古代的中国政府，很少有狭隘的本土利益考虑，而总是要考虑“天下”的。古代所谓的四夷朝贡，其实只是一种表示天下一统的“证明书”，政府并不靠那发财。有时皇帝赏赐给四夷的财物，价值要远远超过贡品的价值。当时政府考虑更多的是天下太平。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332页）到西方国家在中国人面前出现以后，中国人并没有消除那种“天下观念”和“世界精神”，故而出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出现了费孝通先生的文化大同理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6版，第142页）正是这种观念和精神，使中国人不自觉地消除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能够与世界各民族共生、共存、共荣。现在世界国家与民族间的冲突，最根本的就是缺少这种观念和精神，都在坚守自己的利益，都想为自己国家、民族多猎取一份利益，冲突自然就难免了。

第八：礼乐教化的文明制度，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生活环境，开万世太平。



礼乐教化是周代曾经实行过的一种制度，春秋之后礼崩乐坏，到秦汉以后，只是残存一些影子而已。但这种制度却给中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礼乐制度的修复与实践，当然其中也有点理想化。

那么礼乐教化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呢？古人说：“礼者，履也，行也。”就是说礼是人所要履行的规则，包括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尊卑秩序以及礼仪规矩等等。人的嗜欲好恶，都由礼来节制。在古人看来，人与动物不同的就是因为懂得礼。礼与法有点相似，但又不同，法是强硬的、缺少人情味的，而礼则是有温情的，是与道德、教养相联系的。在法的面前，人考虑的是敢不敢那样做；在礼的面前，人考虑的是该不该那样做。又说：“乐者，乐也。”人心中喜乐，便“咏歌舞蹈，自不能已”。礼是社会规定的，乐是内心发出的。所以《乐记》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负责规范人的行为，而“乐”则负责调和人的性情，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乐声中化解。乐还有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教化，感发人的善心，诱导人向上，移风易俗，让社会处于平和的状态中。所谓“教化”，就是教育感化，使人在教育中，将仁义礼智信等社会道德内化为自己的心灵，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所以古人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

这里还要补充说一点。现在社会都强调法制，这并不错，但法制不能遏制人贪得无厌的利益追求和生活享受。而中国古代制礼多半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即《乐记》所说的：“礼者所以缀（辍）淫也。”意思是：礼是为了制止人的过分之求的。荀子说得更直接，他说：人的欲望追求无止境，便会引起争斗和混乱，所以先王要制定礼来规范人的行为，让人懂得节制（《荀子·礼论》）。我们经常把“礼让”两个字合在一起。因为礼和让是相联系的，如果人与人、国与国之间，都能多一份礼让，世界也就会减少很多冲突了。但是对于礼，人并不一定能从内心接受，这就需要教化。就是汉朝的大儒董仲舒所说：“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通过教化，“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这样就可使民风改善（《汉书·董仲舒传》）。教化离不开“乐”，用健康的音乐来感发人的善心，把心中那种不健康的欲望冲洗掉，最后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显然礼乐教化可以补充法制的不足，有利于人类的持久和平。

以上我讲的这八个方面，都是中国文化中对当代人类极有意义的精神资源。这八个方面，我没有按主次排列，只是随意为之，希望不要产生误会。

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万世太平”

正是由于中国文化拥有以上我们所论述的基本素质，因此保证了中国社会乃



至东方社会两千多年的相对稳定、和平、和谐与发展。而且它对于未来世界的和平、和谐与人类的协调发展，必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侧重“求真”的，因而对于探索未知领域充满了兴趣，而且永无止境，至于说这种探索的最终结果会如何？基本上是不予考虑的。中国文化则不同，它是“求善”的，它有一个最终的目标，这就是《礼记》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万世太平”。宋朝有人著《太平经国书》十一卷（郑伯谦），明朝有人给皇帝献《万世太平治要策》（桂彦良），清朝有人写《万世太平书》十卷（劳大舆）。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序》即称“圣人作经，以开万世太平”。中国民众是一个酷爱和平的群体，中国有句俗话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可见他们对于和平的热爱达到了何种的程度！而中国的精英群体，他们的奋斗目标则是“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代的著名思想家张载说过非常有名的几句话，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全书》卷十四）他的这种志向、抱负，代表了古代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理想追求。这是一种非常宏大的理想、抱负，在这样一种文化思想支配下，一切眼前小利，以及不利于人类未来的技术成果，便会统统被抛弃，而把人类永久的安定、团结、和平和幸福放在第一位。因而在世界存在着多种危机的今天，中国文化无疑是人类和平的最大希望所在。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摆开来说。就是所谓“中国落后”的问题。我常听到持“中国文化死亡论”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既然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优秀，历史又悠久，为什么会远远落后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呢？

我认为，这里首先有一个对“落后”与“先进”的价值判断问题。现在人们之所以认为西方国家先进，中国落后，就是看到了西方国家科学技术与经济比中国发达，西方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要高于中国人，像美国、英国人的生活消费要高出中国人好多倍。这就是他们认定中国落后的根据。

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小的误区，是人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现在很多人把人类的发展认定在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上。可是要知道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只是外在于人的生产工具与生活工具、物质条件的发展，是人类创造力的一种体现，而不能代表，或者说不能完全代表人类的发展。人类发展更主要的应该指内在于人的精神的发展、人性的发展，应该是人类精神向道德领域的不断提升。因此看到中国经济与“科技”不如美国，就认为中国落后，这种认识起码是不全面的。人类发展有两个轮子，一是科技，一是人文，两个轮子一起转动，人类才能真正走向和平、幸福、快乐与美满。只有一个轮子转，就会翻车。而现在，“人文”这个轮子几乎停止了转动，科学技术却在高速发展。确实科技发展减除了先